

五年同窗，结缘一生。

30年前，我们羽翼丰满，带着爱
(2) 放飞。

30年来，历经人生坎坷，我们带着爱
(2) 走遍了天南海北。

在国内，
机关、工厂、农村，我们带着2
(爱) 默默奉献。

在欧美，
苦读、打工、创业，我们带着2
(爱) 海归。

事业，
我们2，2得执着2得乐观。
家庭，
我们爱，爱得持久爱得深邃。
如果说四十而不惑的时候，

你我行色匆匆未能将毕业20周年的欢聚尽兴，

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今天，
我们该用坦然和轻松相聚、重逢。

三十年弹指一挥，
即使双鬓染霜，

岁月只能改变我们的容颜，
谁说年华老去、青春不再？

因为2，我们从未疲倦懈怠，
因为爱，我们依然激情澎湃。

来吧，印刻着2字符号、充满了爱的情怀的同学，

让我们共同跑进2017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跑进106年华诞的清华园！

82聚17，把爱聚一起！

价值取向比“干粮”“猎枪”更重要

○ 薛志峰 (1992 级热能)

借用陈吉宁校长探讨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我向《清华校友通讯》投稿的标题。

我1992年从山西榆次考入清华，是空2班的学生，之后在系里读了硕士、博士。自2005年毕业离校，读书和科研的地方从三教后的简陋的实验室、到二校门后古朴的旧土木馆、到自建的节能楼。在清华暖通专业学习的14年，从书本上得到了“干粮”，从参与科研课题和示范项目中得到了“猎枪”，而更加珍贵的是，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养成了正确的

“价值取向”。

有危难的时候要冲上去

1996年我大四，跟着江亿教授测试铁路总医院的冷却塔，摸爬滚打了一个月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这种通过现场测试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研究方法，角色也从三五人的小组长、十几人的大组长到带领一个班学生的大队长。之后在清华的十多个夏天里，我都是在遍布北京城的大楼地下机房或楼顶上伴随冷冻机和冷却塔度过的。

期间的2003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

“非典”来了！

3月份的时候，疑似感染的病例已经在北京出现，中央空调会导致SARS传播的说法也开始引起重视。4月23日晚上，江老师把系里的老师和一些老研究生叫到会议室开会，当晚启动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一、开通非典期间空调专家热线，由研究生轮流值班接听。

二、邀请吴德绳、李娥飞等校友，组建专家小组，每周在紫竹院公园开会。

三、能出校门的，到现场去解决重要建筑物中央空调的安全运行问题。

十年前的事情，除了留在纸面的文字，很多细节都模糊了。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两个场景：

一是启动会上，江老师讲：“非典这么严重，国家现在遇上难了，又和暖通专业有关，咱们这些人得帮着干点儿啥！”

二是当时人民医院属于重灾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感染病例，并且有医护人员

死亡。病人转移到小汤山以后，医院还在被封锁中。5月16日，江老师带着我去重症监护室查看空调系统。病房内一片狼藉，墙上的黑板上还满满地写着病人的名字。我第一次感觉到离死亡的距离那么近。

清华大学特别是江老师对我价值取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有危难的时候要冲上去！这个理念深深地种到了心里。

有困难的时候要闯过去

“非典”终于过去了，刚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写论文赶紧毕业，事儿又来了——“手里没钱，要盖楼！”这事儿严格意义上讲有点儿“没事儿找事儿”。

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后，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安排清华大学就2008年奥运场馆的绿色建筑技术进行研究，300万的科研经费并不宽裕，做一些基础研究和样品测试就可以结题。但江老师觉得这样解决不了未来场馆建设的实际问题，于是硬要在清华校内建一栋3000多平米的真实建筑。于是我又被安排成了“工头”。

8月份，江老师说开工吧，我一想，开工就是把场地规整规整。这个简单，于是喊了两个年级的本科生，也不用给钱，都轰到现场，热热闹闹拔拔草，场面积极向上。接下来就傻眼了。

第一，没图纸，只有一个PPT，盖啥呢？跑清华设计院去质问设计师，设计师说你们只给了个PPT啊，没有设计任务书。于是开始追设计，设计院的老师好打交道，掏心掏肺地谈了一下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设计费再说，人家也把图纸给出了一套。

第二，没手续，不知道盖个楼还有那



2003年非典时期，江亿老师与薛志峰在人民医院，穿着防护服解决建筑物中央空调安全运行



2005年，薛志峰（中）博士学位答辩后与老师们合影。左4为导师江亿

么多个章子需要跑。一跑，傻了，政府的人都不听江老师的。后来一商量，说他们肯定都听市长的。于是给王岐山市长写信。王市长给签了个字，还真管用了，各种手续都加快了，算是合法开工的“三边工程”了。

第三，没有钱，这个是真难了。找江老师一问，说“东西都有，你去和厂家一谈，他们应该就给”。我当时年轻，老师说的都信。立马自行成立了“清华大学超低能耗示范楼筹建办”并自封“副主任”（江老师被我任命为主任，虽然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头衔），跑到照澜院给自己印刷了一盒名片，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片，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期间有些趣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江老师有一天找我谈话，很严肃，指出我现在负责的是基建项目，一定要廉洁，不能拿回扣。我当时一愣，反应过来以后和江老师说：“他们要是除了给咱们捐东西，还能给我送笔钱，您就让我收了吧！”江老师沉思半晌，不置可否。

另一件，开工以后我都是早晨到工

地，晚上再离开，和几十家捐赠企业以及一到中午就端着大碗吃饭的民工兄弟们相伴，问问这个、询问那个，他们都很奇怪“这个戴眼镜的怎么不好好念书，天天在工地瞎晃悠？”

还有一件，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开始答应捐两个立面的玻璃，后来又想只给一个立面的。

江老师开着他最早那辆破桑塔纳，拉上我一路狂奔到秦皇岛，人家确认我俩不是骗子，很给面子，终于答应还是捐两个立面的。回来路上，我们兴高采烈，忽然江老师说：“糟了，车没油了！”我当时还是只富裕到骑电动自行车的水平，也出不了啥好主意，于是先是把空调关了，接着又说别踩刹车，匀速开，如果真一滴油也没了，我下来，找加油站去灌一瓶儿去。提心吊胆地又开了一段，终于看到了加油站，两个人满头大汗，把身上的现金都掏出来加了油。



开工两年以后，节能楼终于建成，薛志峰在楼前留影

后来，节能楼终于盖出来了。厂家都很大度，对我没能给他们实现“以全球视野，放在国际大平台上，永不落幕的展厅”的承诺，也没有计较，十年以后，还尊称我“薛主任”。施工单位有点儿较真，追着我要了四五年钱，看我态度确实真诚，兜里确实没钱，只安排民工围了一次，对方领导约谈了我两次以后，觉得花时间在我身上没用，最终决定去干大工程去了，再也不理我了。

节能楼就是这么克服困难闯出来的。期间，奋战在工地的还有曾建龙，现在成了地产精英，真正的甲方；姜子焱，现在成为年轻的自控专家；以及调试期间躺在架空地板上睡午觉的建环1班的孩子们，现在很多都成为单位的小头目。

十多年来，每每回望节能楼，庆幸的是那时候江亿老师的其他学生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经验管工地，我临危受命成为工头，之后的八百多天，我都是早晨到工地，晚上再离开，由于仅有300万的科研费可以支付，因此项目开发得很慢，小小的四层楼建了两年半，估计创造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记录。虽然慢，但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让一个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有机会解剖了一个完整建筑物建造环节的所有细节。至今我都保存着近10G的现场照片和好几大纸箱的文字资料。

清华大学特别是江老师对我价值取向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有困难的时候要闯过去！

不论干什么都要像个样

2006年我博士毕业，放弃了留校

机会，进入当代MOMA房地产公司，担任了集团公司的研发总监，分管集团的设计公司和工程公司，过了一段金领生活。

2008年我带着建环1的张永宁、建环3的李处林，创办了北京唯绿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后有很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唯绿大家庭。在团队共同努力下，公司快速成长，成为建筑节能行业的一家代表性企业。2013年，公司并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成为一家央企的下属公司，业务日趋稳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6年，我放下唯绿的日常管理，创办了北京太和人居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中关村沃土当中的一名“连环创业者”，致力于新农村和新园区建设中的市政微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一路走来，清华大学，特别是江老师对我价值取向的第三个影响就是：不论干什么都要像个样！这个理念已深深地种到心里。

结 语

我是个好学生，爱念书、爱上学。走出清华以后，读过北大的EMBA，上过北京市委党校，回首来看，清华的14年，是改变我至深的岁月。

暖通专业是一个上进的专业、干事的专业，特别是我的授业恩师江亿院士，以他为代表的老师们和学长们，不仅给了我干粮、猎枪，更重要的是给了我正确的价值取向。那就是：

有危难的时候要冲上去！有困难的时候要闯过去！不论干什么都要像个样！